
电子图书
信息技术的结晶
人类文明的载体
网络的基本资源

## 一、倾斜的谈判桌

对于龙的传人来说，“八·二九”是个极为苦痛的日子。

150 年前的这一天，南下关江面上聚集了 80 余艘英国军舰。所有舰只都高悬大不列颠国旗，甲板上站满身着蓝紫色鲜艳新装的英国官兵。他们挥动着手中的武器，尽情地高呼：“女王陛下万岁！”远道而来的英国人为什么这么颠狂呢？原来，就在这天中午时分，清政府代表耆英、伊里布、牛鉴与英国全权代表璞鼎查在一艘名叫“汗华丽”号的军舰上签署了一个让中华民族蒙受奇耻大辱的条约——《南京条约》（因南京又称江宁，故《南京条约》也称《江宁条约》）。

其实，英军这种歇斯底里的庆祝胜利的场面，是事先安排好的。因为那天在“汉华丽”号上进行的中英签约仪式，仅是履行手续而已。在此之前，谈判桌的天平早已倾向英国一方。

“对条文的字眼或措辞一点吹求都没有，为欧洲的外交家们所如此尖细地钻研和谨慎的考虑过的条文，只占去（清政府的代表们）一刹那的注意力。他们的所有心事都集中在一个主要的目标上，就是要我们赶快撤离。这心事之强烈，已到了无法掩饰的程度。结果，差不多是异口同声地表示同意，他们恳求全权大使撤走舰船。”——这是摘自当年英方谈判随从利洛笔下的一段记录，它维妙维肖地勾勒出其时清廷谈判代表耆英、伊里布、牛鉴等人急于求和的心态。

有位学者还指出：这次谈判显然是处于英国武装的优势之下，不得不听命于需要的支配。

这话一点儿也不假。

那是 1841 年（道光二十一年）秋末，英军连续攻陷了浙江三城：定海、镇海、宁波。

为了加强防御，坐在龙椅上的道光皇帝任命奕经为扬武将军，赴浙江应战。

奕经虽是皇室要员，但却是一个不中用的草包。在南下途中，一路游山玩水，沉缅酒色，视战争为儿戏。

1842 年 1 月 25 日，他忽然做了一个梦：英军统统上船逃出了外洋。

这是一个“吉祥的征兆”！——他周围的一帮马屁精纷纷阿谀奉承道。作为参赞大臣的文蔚，竟附和说自己也做了一个同样的梦。

于是，这位皇室的金枝玉叶“夜不能寐”，决意实现梦幻中的“胜利”。

3 月 10 日，奕经下令发动总攻，企图一举收复定海、镇海、宁波三个城市。

此刻，远在京都的道光皇帝也做着美梦，表示若“待捷音”，一定“立颁懋赏”。

然而，实现梦幻中的“胜利”谈何容易。一经接仗，清军便败下阵来。

恰在这时，有位名叫钟人杰的又在湖北崇阳发动了会党起义。清政府顿感“外患未除，内讧又起”，皇帝马上告诉他的大臣们：“攘外必先安内，禁暴民即以爱民。”

3 月 21 日，浙江巡抚刘韵珂乘机呈上一个“十可虑”的奏折，除极言英军战斗力强大外，重点报告了清军漕粮难征、财政紧迫的情况，并点明无法再与英国打下去，要求皇上拿主意乞和。

刘韵珂的这个奏折正中清廷的下怀。

3 月 28 日，道光皇帝调广州将军耆英改任杭州将军，并重新起用上一年革职的伊里布同赴浙江与英军议和。4 月 7 日，又给耆英加上一个钦差大臣的头衔。

对于耆英来说，这无疑是天赐良缘。因为他是当时有名的主和分子。当皇上让他南下“设法羁縻”时，他竟脱口说道：“好了，天意回转，另有办法了。”

他有什么办法呢？他的办法就是投降！

然而，清廷越想乞和，英军越是嚣张。

在英军看来，长江下游是中国最富庶的地区，而南京又控制着长江、运河两大水道，江南的大量漕米和税银，都要汇集到南京。因此，如果占领南京，就等于掐住了清政府的咽喉。所以，英军拒绝议和，决定按原计划入侵长江，直扑南京。

5 月 18 日，英军攻陷江浙海防重镇乍铺。

耆英闻报，当即向清廷奏称：我军“万难再与争持”，“舍羁縻之外，别无他策”。

6 月，英军进犯长江。

其时，江南提督、年近七旬的老将陈化成，率领水陆官兵 5000 余人守吴淞炮台，抗击英军。在激战中，他身负七伤，仍亲自燃炮，轰击敌人。

但可悲的是，由于扼守侧面的两江总督牛鉴等临阵脱逃，放弃炮台，致使陈化成腹背受敌，最后血染战衣，以身殉国。

6 月 16 日上午，英军攻陷吴淞口。

同一天下午，英军又占据了宝山。

时隔三天，亦即 6 月 19 日，上海也沦入敌手。

英军下一步进击的目标是哪儿呢？

在京都，人们盛传英国赴上海之后的下一个目标是天津和北京，并且出现了有一支扩大的舰队向北行驶的流言。

于是，不少大员纷纷到平谷县（距北京 150 里，四周都是山）等地置购房产，迁移家眷，准备逃难。道光皇帝也急忙把驻守在长城外的军队召回防守山海关。其他军队则驻扎在喜峰口——这是从华北平原通向热河的重要通道。6 月 28 日，道光皇帝还任命军机大臣赛向阿为钦差大臣亲赴天津，以扼守通向京都的门路。

然而，“这个政府好像就不曾料到我们会进攻这个被选定的重要据点（指镇江），它如此全神贯注地准备抵抗意料之中的对京城的进犯，竟完全忽略了长江防备，待到发觉，悔之已晚……”——一位名叫欧彻伦尼的英方参战者这样得意地说道。

欧彻伦尼看出清军忽略长江防务是千真万确的。

其实，自吴淞之战以后，整个江南地区的防务就处于瘫痪状态之中。钦差大臣耆英和伊里布此时不仅力主和议，而且唯恐加强防务会给他们的议和活动带来不利影响。因此，一方面让常熟、昭文、通州、靖江、江阴、丹阳沿江各州县，“馈送英夷牛羊，勿与构怨”；另一方面又派白含章、陈志刚等人与英军接洽议和。两江总督牛鉴则自吴淞口落荒而逃后，先至苏州，后抵镇江，直到南京才不得不停住脚。

用时人梁廷枏的话说：鹅鼻嘴、圌山、焦山、金山等长江“诸险，全未

设备，而近水可以设伏之丛沟荻港，皆虚为兵炮。”

这样一来，英军从长江口到镇江，简直如入无人之境。

当时，镇守镇江的清军只有 2400 人，而来犯英军则达 1.2 万人。

在英军看来，镇江城可谓垂手可得。

可他们万万没有想到，当 7 月 21 日战斗打响后，来犯英军遇到了顽强的抵抗。柏纳德在《“复仇神”号轮舰航行作战纪》一书中这样记述道：

“第 55 团和马德拉斯本地步兵第 6 团和来复枪队一道……,争相攀登云梯；不过满军（即清军）也在那里拼命作战……，步步为营，誓死抵抗。

许多参加这次战役而亲眼见到满军坚决作战的人，都能够讲出一些故事。很多满兵直向我军的刺刀冲上前来。有的时候，满军冲到我军警卫哨来，将我方士兵捉住，然后抱起来一起跳下城墙去。还有一两次，满军士兵在被我军刺刀刺伤以前，居然能够把我方士兵摔下城墙去。满兵的肌肉很发达，当他们穿上宽阔制服时，更使人看出他们的强健。他们在和我们用大刀拼搏或作短兵相接的肉搏战时，总是不畏缩的。……

那天早晨，约在 10 点钟左右，‘布郎底’号所属的几条小船，奉命重新载上一部分炮兵队和东印度炮兵并带两门榴弹炮，前去援助陆军向西门进攻。……中国军队发来的炮火，曾对我方前进的船只给以致命的打击。仅在 10 分钟左右的战斗过程中，我方 16 号海员和 8 名炮兵都受了伤。……

在第三旅沿着城墙脚下集合的时候，一队满兵突然向其打来激烈的炮火，因此，我方两名军官阵亡、两名军官受伤，还有几名士兵被打倒在地上。……

当我军行经旗营内一条狭窄街道（在一个小城门后面）时，一队满兵忽然从街的对面向我军打来几枪，而且看来他们要在那里进行极其坚决的抵抗。……

就在有组织的抵抗停止许久以后，我方几位军官还得用大刀来防卫他们的生命。马德拉斯本地步兵第 14 团某军官，曾和 3 名满兵进行了一次短兵相接的肉搏。……

镇江府是满军认为一个坚强的据点。……他们难以忍受失败，不能容许这班来历不明而且可恶透顶的野蛮人，来亵渎他们的家园，来践踏他们的土地，因而每一家房子里，都有它的殉难者。”

镇江城破之后，英军兽性大发，纵兵烧杀。一个侵略分子供认说：“只要是真实的回忆，就可觉得这颗心很难说是有人道的了。但即使是心肠最硬、资格最老，以杀人越货为生的人，看到这种悲惨景象，也不能无动于衷的。”

镇江失陷以后，道光皇帝已拿定主意，彻底屈膝投降。当有人奏请把沿江商民盐枭组织起来抗敌时，他竟朱批道：“无人，无兵，无船，奈何，奈何！”

7 月 26 日，也就是道光皇帝接到镇江遭难的详尽报告的那一天，他命令耆英和伊里布：

“前往京口（镇江对面）以适当方式处理一应事务，万一该逆定要进入省会（南京）进行骚扰，则准许该员暂且经由谈判试予羁縻。设若该夷犹疑不定，则告知他们已有谕旨下颁，着令耆英和伊里布专门负责此一事体……。”

所谓“羁縻”，实际是投降的代名词！

7 月 31 日和 8 月 1 日，耆英在南京又接到来自宫中的两封机密信，要求

他遇事尽可“便宜行事”，不能“稍涉游移”，务必“从权办理”！

此刻，辅佐道光皇帝的首席军机大臣穆彰阿更公开提出：

“兵兴三载，糜饷劳师，曾无尺寸之效。剿之与抚，功费正等，而劳逸已殊。靖难息民，于计为便。”

尽管耆英和伊里布向英军头目璞鼎查频送秋波，但英舰仍按原计划于 8 月 14 日驶抵南京下关。

当英军兵临城下之际，清军压根儿未作布防。因为在耆英、伊里布、牛鉴看来，南京是英国侵略者指定的议和地点，他们怎能在这里与对方搞僵呢？

就在英舰驶抵南京下关的第二天，英军就给两江总督牛鉴发出了照会，要求清军马上“缴银 300 万元，为大英战费之项”，只有这样，英军才保证不攻击南京城，否则“本军门等亦碍难稍为戢兵，仍当力行争仗”。

其时，璞鼎查又声称，清廷的议和代表必须具有充分的权力来“独立解决问题”。否则，就不与之接触。

耆英则马上答复道：英国人所说的“全权”一词与自己担任的钦差大臣的头衔，并没有什么差别。

8 月 7 日，耆英和伊里布接到一道上谕。内称“该夷等所议与所请之事，若在情理之中，卿等当可允准。卿等尚应讲明，在卿等共同满意地商榷，并向圣驾奏过之后，尽可付诸实施，无须再有犹豫……。”

从这个诏书中，耆英取得了英人所说的“那种广泛的议和权力”。

英方首席翻译马儒翰验过耆英的“钦差”任命状后，同意与之“和平谈判”。

用英人的话说，耆英和伊里布当时的谈判策略是委派低级官员“去与英军头目会晤，观察其口气与措辞如何，而后再派较高等级的官员去谈实质问题”。

8 月 8 日，伊里布和牛鉴商议后，首先派出五品军功顶戴张喜、外委陈志刚及谢继超、刘建勋等 5 人来到英舰“汗华丽”号上与英方代表总管领事麻恭、译员马礼逊、罗伯聃、郭士立等人交涉贸易和赔款问题。

有趣的是，张喜的军功顶戴是临时赐予的。耆英给皇帝的奏折中曾这样透露：“值此吾人派员往夷船交涉之时，最要者厥在所派之人应为熟谙夷情之人，可望其有裨事体之人。如今奴才等商议此事，不得不令张喜暂着军功顶戴……如此夷人始不敢轻视于他。”

陈志刚则以与洋人打交道而出名，人称“临时的使节”。

当时，英方开列的条件主要有三点：“即赔还所夺之货物（指鸦片），及年来之战费，一也；其两国官员，嗣后以友理相待，平行通交，二也；割让海岛，以给英人居住贸易，免致再酿争端，三也。”

8 月 12 日和 13 日，张喜等人与麻恭等在南京北门仪凤门外净海寺内又会谈了两次，但毫无结果。

傲慢的璞鼎查对这种东方外交传统中利用下属而不牵涉自身的做法大为恼火。他强烈地斥责了这种拖拉的策略，要求清方改派更高的官员，否则将再度使用武力。

璞鼎查的威胁果然马上见效。当 8 月 14 日继续会谈时，江苏按察使黄恩彤、四等侍卫前吉林副都统咸龄出场了。英方谈判随从利洛这样记述道：“我们在庙（指净海寺）的广大的入口被一群中国官吏——白蓝顶以至铜顶——欢迎进去。和我们不同，他们穿着绣花的丝绸或织花的的薄纱，剪裁既美，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质料又佳，若在我国，非妙龄美女，不足以着此。他们向着我们鞠躬致敬，执礼甚恭。等我到了大厅，黄秘书（即黄恩彤）与满洲将军咸龄站在门外，肃我等入室。马礼逊将我们一一介绍，然后我们坐在能坐两个大胖子的椅子中……

等我们将草约议好之后，用中英文缮写两份，一份由中国官吏带回，一份由麻恭带回，以供璞审阅。当我们在起身要走的时候，这位老满洲将军说道：‘ 条件太苛了……两国间的战争，胜负往往决定于机会，但败方必须偿付胜方 ’ ”。

这个利洛看出，中国官吏当时一点儿也不隐饰急于求和的心情。

到 8 月 17 日，无条件的投降丑剧进入尾声。张喜这样写道：“ 张攀龙取来该夷议覆和约草稿，前半本系汉文，后半本系夷文，于前议三大端之外，又增十数条，共载十三条 ”。

既然投降的丑剧已进入尾声，耆英、伊里布、牛鉴很乐于在这个时候拜访自己的对手璞鼎查，以便最终完成议和的使命。

8 月 20 日 11 点过后，这三名皇室代表穿着笨重的满洲靴应邀来到 “ 汉华丽 ” 号英舰上。“ 他们生怕有危险，所以举动很缓慢。当英人献上咖啡、茶酒、糖果、樱桃、白兰地等食品后，耆英等人则赞不绝口。 ”

在这次会见中，这三位清廷代表竟然闭口不提有关条约的事，而是与璞鼎查讲了些涉及音乐、武器等不着边际的废话。

时隔三天，亦即 8 月 24 日，璞鼎查又回访了耆英等人。

就在这一天，耆英接到皇帝 “ 不准在于福州通市，即万不得已，或于泉州附近，酌与通商 ” 的上谕，遂派员与英方商议，结果遭到马礼逊的拒绝。

8 月 26 日，璞鼎查等人又入南京城与耆英再次会谈。耆英为了以自己的 “ 诚心 ” 取悦侵略者，竟然丑态百出，给后人留下了笑柄。

还是那位英人利洛观察得仔细，他又这样描述道：“ 今天是被指定亨利 璞鼎查与钦差们磋商并最后决定条件内容之日。

……

当我们入座之后，音乐又起，似比我们第一次听到的较好，在我们吃饭时，一直未停。年青的戴白项子的官吏们端茶敬酒，捧上点心，几位钦差通过翻译和大臣谈天。

各种的食品如细肉馅的点心、猪肉竹笋、肉丝汤面、猪耳和别的许多奇怪的菜品，盛在小磁碗中，置于银碟之上。一样一样地端上来，我们吃的愈多就愈引起观众的赞叹，但人类的食量究竟有限，最后耆英为了表示致敬，要求亨利爵士将嘴张开，用灵巧的手法扔进几块大的糖饯梅子。我永远不会忘记亨利爵士发现抗议无用，只能忍受的表情，同时我更不会忘记耆英就站在亨利爵士之前，如像一近视眼老太太穿针的姿势，将糖果拿在手中向内扬的姿势。

在这以后侍役们把桌子收拾干净，公事由此开始。

用中英文写出的我方要求，又重新被朗读一遍。除了最初中国方面对于我方要求占据舟山，以作为中国交纳二千一百万元赔款作为保证，表示不同意，并要求将福州府不要作为通商口岸外（后来连这一点也屈从了），其余条款完全同意。 ”

本来，按照双方的约定，拟于 8 月 27 日举行签字仪式。但由于伊里布生病，只好推迟到 29 日。

据透露，伊里布早就患有肝病。到会谈后期，旧病复发，体温‘时冷时热’。8 月 26 日那天，他请求英国医生伍斯南大夫替自己看病。伍斯南给伊里布开了药方，并要求他派一位随从到英舰‘皇后号’上取药。伊里布的管家张喜去执行这个任务，但他在英舰上喝了酒，把服药的说明书弄丢了。可他又不敢向主人如实禀报，而是撒谎说把‘全部药丸和药水’一次服下去。结果，伊里布的病情进一步加重。到 8 月 29 日签字那天，伊里布‘被抬进舱中，安置于沙发之上，在整个会见期间，一直躺在那里’”。

对于侵略者来说，8 月 29 日签约的场面确是激动人心的。利洛这样炫耀道：“这是一个光荣的景象。离着中国最大河流口 200 英里，在它的故都的城垣之下，在一个具有 74 座炮位英国军舰的船舱内，中国第一次被迫缔结的条约，并由三位最高的贵族，在英国国旗之下代表天朝签了字。”

这个签了字的条约，就是《南京条约》！也称《江宁条约》、《白门条约》或《万年和约》。

这个在炮口下威逼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共计 13 款,其主要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五口通商。该约第二条规定：“准英国人民带同所属家眷，寄居大清沿海之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等五处港口，贸易通商无碍”。这五处港口，即所谓通商口岸、通商码头或条约口岸。

2．割让香港。该约第 3 条赫然写道：香港由英国“常远主掌，任便立法治理”。

3．赔偿巨款。该约第 4、5、6 条分别规定，中国赔偿英国烟价、军费等 2100 万元，其中鸦片费 600 万，商欠 300 万，军费 1200 万。这笔巨款全用中国“白银支付，并且装运到伦敦或加尔各答，……在那里重加铸造，每一银元约可得四先令六便士。”

4．协定关税。该约第 10 条规定：“英国商民居住通商之广州等五处，应纳进出口货税、饷费，均宜秉公议定则例，由部颁发晓示，以便英商按例交纳”。

5．释放卖国汉奸。该约第 9 条规定，凡是犯有叛国罪行的买办奸人，“均由大皇帝俯降谕旨，誉录天下，恩准全然免罪；且凡系中国人，为英国被拿监禁受难者，亦加恩释放。”

显而易见，英国从这个条约中得到的是种种权利，而无需尽任何义务；中国所承担的全是义务，而没有任何权利。

不是么？首先就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等五个通商口岸而言。乍一看，国与国之间进行正常贸易，以有易无，经济互通，岂不是件两全其美的事。但后来的实际情况表明，当时中外通商是在入侵者要把中国变成它的原料供给地和推销剩余产品市场的前提下进行的，根本谈不上平等互利。由于中国失去了主权，当时中国的门对谁开，开多大，已不是由中国政府作主，而要洋大人说了算。更何况，到中国各通商口岸做“生意”的多半不是商人，而是些穷凶极恶的海盗和无赖。一个外国学者这样记述道：“上海开埠以后，无恶不作的亡命之徒从四面八方聚拢在这里。其中有逃亡的水手，有遭贬斥的醉鬼，有来自加利福尼亚的投机破产者，有来自香港与澳门的罪犯，也有来自菲律宾等地的埠头流氓。”即便是真正的通商，也是入侵者单方面受益。对于西方列强来说，其工业制品尾随大炮叩关而入，二三十年以后，洋布、洋绸、洋伞、洋油等名目繁多的“洋货”，“通行各口，销

入内地”，致使中国大量白银外流，“华人生计，为其所夺”。

正因为这种开放、这种通商能使入侵者单方面受益，所以，若干年后，西方列强又通过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强迫中国开放了牛庄、登州、台湾、汉口、九江、南京、烟台、天津、重庆等一大批沿海和内地城市为商埠。

强占香港则破坏了中国的领土完整。

英国之所以要强占香港，是企图在军事上和经济上控制中国。用英国外交大臣巴麦斯顿的话说，“香港是插入中国领土的一个楔子，同中国大陆的关系正如瓦特岛之于英国，长岛之于美国”一样。有了这个“楔子”，大不列颠的舰队便可在那里停泊，以对中国实行炮舰政策；有了这个“楔子”，英国烟贩子便在那里囤积鸦片，以向中国大陆进行走私；有了这个“楔子”，一切非法活动都可以在英国的公开保护下进行。

勒索赔款则直接导致了中国的进一步贫困化。

其时那笔 2100 万元的赔款，相当于清政府全年财政总收入的三分之一。在此后的四年中，清政府财政支出的十分之一被用来支付这笔巨款。

至于协定关税一条，又剥夺了中国自行规定关税的主权。

按理说，如何征收进口货物的关税，完全是一个主权国家的事，而如今却需要“议定”。也就是说，日后中国增减进出口货物税率，非经英方同意不可。这就为外来商品侵入中国提供了世界上少有的便利条件。更严重的是，协定关税还使中国海关失去了保护本国工农业生产的作用。若以“关税制度是发展国家工业的主要工具”的观点看，协定关税直接导致了近代中国工业无法起飞。

《南京条约》是勒在中国人民脖子上的第一根绳索，或曰：戴在中国人手上、脚上的第一副手铐、第一副脚镣！——有的学者这样形容道。

这话一点儿也不假。《南京条约》恰似一根绳索，勒得中国人民喘不过气来。自此以后，众多的炎黄子孙便生活在一种绳索羁绊的氛围中；中国社会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一个独立自主的封建社会的中国变成了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中国。

“八·二九”是近代中国的第一个国耻日。炎黄子孙切莫忘记这一天！

## 二、罂粟之妖

说到“八·二九”外国强迫中国签订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不禁让人联想到一种名叫罂粟的小花。这种小花有鲜红、橙红、粉红、白色或黄色，以艳丽为其特质。而这种艳丽的小花，又进一步勾起中国人民多少饱含血泪的回忆，痛心疾首的愤慨。

罂粟是一种既能救人又能杀人的花儿。它有花有果有子。子能入药，果汁能提取麻醉剂和毒品。这毒品就叫鸦片，又叫阿芙蓉，俗名称大烟。这种令人可憎的东西，原先并不产于中国，也不是供人吸食的。它产于南欧和小亚细亚，一般被当作药材使用。由于它内含吗啡和生物碱，具有镇痛、镇咳、止泻等医疗功效，1767 年以前的中国法律允许进口少量的鸦片。那时，经营这宗买卖的主要是葡萄牙人。但是，英国毒品贩子看得眼热，也插手这项贸易。于是乎，鸦片就像一股黑色的毒流，迅速冲击着古老的中华大地。随着吸食之风的弥漫，它已完全失去了医疗的作用。

“罂粟很有耐性。吸食过一次鸦片的人，肯定还会吸。鸦片懂得等待。”“一旦尝到鸦片的滋味之后，没有鸦片而活下去是很艰难的。”——法国著名作家科克托在《鸦片烟》一书中这样一针见血地写道。

吸食鸦片必上瘾——这话一点儿也不假。而一旦上瘾，瘾君子便完全成为鸦片的奴隶。尤其是抽鸦片后 4 至 12 小时，烟瘾发作而找不到鸦片时，瘾君子的感觉比死还难受，只有马上吸食才能消除痛苦。一份报告书这样说：“其症状为极度的心神不安、烦躁、全身发寒、脸上发烧、打喷嚏、出虚汗、淌口水、流鼻涕，有的人还有恶心、呕吐、腹泻等胃肠性不适。腹部、双腿和背部严重痉挛；全身骨头痛，肌肉抽搐；神经兴奋、发颤。每一种症状与其他症状相矛盾。烟瘾发作时，瘾君子很饿，但又吃不下；而且很困，却又睡不着觉”。倘若不及时戒烟，烟瘾还会愈来愈大，鸦片剂量也愈抽愈重。从而导致吸食者发生心理变态、性格变态、性变态等一系列难以医治的疾病。

吸食鸦片在人体生理上引起的副作用是显而易见的。1836 年，江苏一位文人对鸦片的危害就作了如下的描写：

吸烟耗尽人的生气；

吸烟妨碍事业的正常进行；

吸烟耗损了人的肉体；

吸烟浪费了一切财产；

吸烟使人相貌不扬；

吸烟促进了淫猥；

吸烟泄露了机密；

吸烟触犯了刑律；

吸烟伤害人的心肺；吸烟毁灭人的生命。

由于吸食鸦片成瘾难戒，有人还用相思的男女来比喻瘾君子对鸦片的依赖程度。于是，罂粟在中国诗人的笔下又被称作“相思草”。有个名叫王尚辰的写了一首题为《相思曲》的长诗，愤怒地谴责了鸦片的毒害：

炎荒瘴毒金蚕蛊，

皂鸦（指鸦片）嘬人肌骨腐；

磨脂滴血捣春华，

搏就相思一块土。

相思土碎青烟飞，
拌使内地输金钱；
阎阎元气日浇薄，
氤氲化作相思天。
相思兮相思，
朝暮无已时。
但愿不识相思味，
待到相思悔已迟。
吁嗟乎！
世间多少奇男子，
一生甘为相思死。

在近代爱国诗人龚自珍的笔下，也有一首讽刺官僚们吸食鸦片丑态的诗。诗云：

鬼灯队队散秋萤，
落魄参军泪眼荧。
何不专城花县去？
春眠寒食未曾醒。

诗人看到，当时一些官僚地主，已成为“鬼灯队队”的烟客，烟瘾发作时，他们涕泪交流，显出一副鬼样子！

从当时的情况看，吸食鸦片的现象起初还只是少数富家子弟。后来，这种嗜好传遍了社会各阶层——商人、政府官员、一般苦力以及妇女和僧尼道士也吸食起来。

据有人估计，在 1838 年前后，在京官中有十分之一、二，地方官中有十分之二、三吸食鸦片，至于“刑名、钱谷之幕友，则有十分之五、六；长随、吏胥，更不可以数计。”

士兵中吸食鸦片的风气也在蔓延。据吉林将军祥康透露，在沿海七省的士兵中，不抽鸦片者，简直寥寥无几。成千上万的武装士兵腰带上挂着鸦片烟筒，正如他们对待平常作为服装一部分的扇盒那样，毫不在乎。

一些外国观察家发现，在中国各大城市中，鸦片馆就像英国的杜松酒店一样普遍。

拿在“辇毂之下’的北京来说，不少鸦片烟馆是由在职官员开设的。

距京都咫尺之近的天津，文人们笔下的景象是：“烟馆林立”，“烟具陈列街前”。

至于天高皇帝远的各地方，更是无法无天。

一个瘾君子，一天究竟要吸食多少鸦片呢？

据时人包世臣的统计。当时一般吸鸦片者平均每天要在鸦片上耗银一钱（1/10 两），而鸦片的市价四倍于同样重量的银子。抽鸦片者每天平均需吸 2.5 分重（1/4 钱）的鸦片或 1.7 分的鸦片膏。

由于数千、数万、数百万枝烟枪既对着男人，也对着女人，既对着平民百姓，也对着达官贵人，在短短几十年内，不知有多少穷人、多少富人在这种枪口下慢慢地、慢慢地倒下去了……。

到 1835 年，中国吸食鸦片的人数已不下 200 万人，竟占当时全国人口总数的 1/66。

此事连英国人蒙哥马利·马丁也感到：“鸦片贩子在腐蚀、败坏和毁灭

了不幸的罪人的精神世界以后，还折磨他们的肉体”，鸦片贩子就像“贪得无厌的摩洛赫（古代人信奉的要用活人祭祀的神）时时刻刻要求给自己贡献更多的牺牲品……。”

一个美国传教士也说：“地球上，也许没有什么地方比那些邪恶的茅棚（指烟馆）的周围地区更接近于地狱了。”

当时，英属东印度公司几乎垄断了全部在华鸦片贸易。一个名叫格林堡的学者通过详细考察，这样写道：到 1800 年，英属东印度公司“在中国推销鸦片的技术，发展到了完善的地步。”从 1830 年开始，英属印度政府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开辟了 15 个种植罂粟的新产区，制定了对超产农户的奖励办法，从而使孟加拉鸦片的生产和销售量增加两倍以上。

据统计，1800 至 1820 年，东印度公司和鸦片贩子用行贿为走私铺路，每年平均对华销售鸦片 4244 箱。1822 至 1830 年，每年平均销售鸦片 11804 箱。1831 至 1838 年，每年平均销售鸦片 27557 箱。

“鸦片同金子一样！”一个名叫泰勒的英国鸦片贩子这样说。

那么，可耻的鸦片贸易究竟能给英国资产阶级带来多大的利润呢？

以 1835 至 1839 年为例，鸦片收入每年 1800 万卢比，折合白银 59.6 万余两。

伦敦的“东印度与中国协会”主席、下院议员、资本家集团代表拉本德等人在 1839 年 11 月给外交大臣帕麦斯顿的信中情不自禁地谈到：自 1837 年 7 月 1 日到 1838 年 6 月 30 日，广州从英国进口货物中，仅鸦片一项就占了 337 万英镑，抵消了当年全部中国对英出口额 314 万英镑还有余。

正因为如此，英国政府和商界对鸦片走私历来采取一种包庇和欢迎的态度。

英国外交大臣帕麦斯顿在给首任驻华商务监督律劳卑的训令中，曾直言不讳地提醒：“不要忽视这样的事实，他无权干预或阻挠英国在中国早已获得的鸦片贩运特权。”

英国资产阶级的孟买商会在《致大不列颠各地东印度与中国协会书》中，更恬不知耻地赞颂鸦片贸易说：“输出鸦片对于商务是有重大意义的，也就是把那个人口最多、资源最富的帝国的财富吸收出来，而用鸦片换来的白银，则使英属印度的大片土地喜气洋洋，人丁兴旺，也使得英国制品对印度斯坦的输出大为扩张，更使得这方面的海上航运与一般商务大为兴盛。并且，还给英属印度的国库带来一笔收入，其数超过整个孟买全省的田赋总额。”

在那些年代里，英国靠走私鸦片由穷光蛋变成百万富翁的不乏其例。有个叫维廉·查顿的苏格兰穷光棍汉，1820 年远涉重洋来到广州，投身贩毒活动。八年后，人称“铁头老鼠”的查顿和另一个英国鸦片贩子马地臣合伙开设了一家拥有武装船队，年走私鸦片 6000 箱，可获利 10 万英镑的公司：查顿—马地臣公司。马地臣还在澳门创办了《广州纪事报》，每期都公开登刊鸦片的行市，广为宣传这项肮脏的贸易。时隔四年，亦即 1832 年，他俩又将这个公司扩大为怡和洋行。据查顿在其私人信件中透露：“在最好的年头，每箱鸦片毛利可高达 1000 银元。”他还无耻地夸耀，走私鸦片“是最安全和最有绅士气派的投机生意”。这两个强盗后来当选为国会议员，马地臣竟被封为爵士。英国资产阶级把他们视为“英雄”。

在查顿、马地臣一类毒贩、强盗大发不义之财的同时，中国的白银却日趋减少。据估计，1840 年前的 40 年间，中国约有 3 亿至 4 亿元白银外流，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相当于当时货币流通总额的 1/5。用白银换来的黑色毒药则使吸食者——包括贵族、官僚、地主、商人、乃至宫廷太监、幕友、差役、轿夫、娼妓、优伶、僧尼道士、兵丁和农民的心灵和肌体受到极度摧残。人民群众视罂粟为“妖花”，比鸦片为“毒蛇”，斥走私船为“鬼船”，愤怒控诉西方列强“贩卖鸦片，毒我生灵，伤民命奚止数百万众，耗民财奚啻数千万金！”

## 三、林则徐销烟

到 19 世纪 30 年代中叶——当鸦片像一股黑色的毒流涌向中国，且呈泛滥之势时，坐在龙椅上的道光皇帝再也不能熟视无睹了。

当时，有一名叫黄爵滋的京官注意到：以往的禁烟措施不外严密查访，在全部海岸扩大巡逻，并对鸦片窑口老板处以重罚。但是中国万余里海岸线，随处都能出入，真是防不胜防。更何况，烟贩和鸦片窑口之所以能够受到庇护，关键是因为有不少官员、稽查员和有权人士本身就是瘾君子。所以，黄爵滋认为，要遏止烟毒，最好的办法是先重治吸食，向瘾君子施加压力。

正是基于这种想法,他于 1838 年 6 月 2 日向道光皇帝呈上闻名全国的《严塞漏卮以培国本疏》，要求用死刑来严惩吸食鸦片者。

黄爵滋这样写道：

……自今年某月某日起，至明年某月某日止，给予一年的期限“戒烟”。不管烟瘾多大，在这期间也能戒掉的。如果一年之后仍然吸食，那就是不奉法的乱民，应处以重刑。

按过去的法律，吸食鸦片者，罪仅枷、杖，……这都是“活罪”。断瘾之苦甚于枷、杖，所以甘犯明刑，不肯戒烟。

如果罪以列论，则临刑之“惨急”更甚于瘾，所以宁愿断瘾而死于家，必不愿受刑而死于市。……

严刑往往会累及无辜的民众，但吸食鸦片者是否有瘾，立即可以辨清。所以不会因重刑而产生弊害。……

爪哇人本来是轻捷善斗的种族，红毛人制造鸦片，诱使其吸食，因此精神大衰，终被征服。红毛人在本国有吸食鸦片者，则在众人环视之下，将该人绑于杆上，用炮击入海中，所以没有人敢吸食鸦片。……各国只有人制造鸦片，而无人吸食。……以外夷的力量都能令行禁止，何况我皇上雷霆之威，赫然震怒，则任何愚顽之人也会戒掉鸦片。

这样，既可防止白银外流，银价也不会上涨。然后研究理财之方，就会给天下万世臣民造福。

黄爵滋的这篇奏文写得极为出色。它深深地打动了皇帝的心。道光皇帝把这个奏折交给各省总督、巡抚以及盛京、吉林、黑龙江的将军“议奏”，渴望听听他们的意见。

10 月间，封疆大吏们的复奏陆续送到了皇帝的面前，但遗憾的是，在 28 份复奏中，赞成黄爵滋的观点的仅有湖广总督林则徐、两江总督陶澎、四川总督苏廷玉、河南巡抚桂良等极少数人，而大部分要员仍主张按“定例”办事，认为对“吸食者论死”的做法太重。

不过，幸好林则徐等少数人的奏折颇有说服力。林则徐告诉皇帝，大病须下重药，对鸦片吸食者来说，只有“死罪二字，足以怵其心志。”如果再不禁绝鸦片，“若犹泄泄视之，是使数十年后，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兴思及此，能无股栗。”与此同时，林则徐还提出六项禁绝鸦片的建议，并附上两种戒烟断瘾的丸方、饮方，盼能颁布各省，以资疗治。

如人所知，兵和饷是清朝统治者的命根子。要是“无兵”可使，“无银”充饷，那将是一种什么局面！听了林则徐的话，道光皇帝不战而栗。他思忖再三，遂于 10 月 25 日发布谕旨，要求各省将军、督抚“振刷精神，力祛积

习”，“趁此整顿之时，同心合意，不分畛域，上紧查拿，毋得稍行松劲。……其贩运、开馆等犯，固应从重惩办，即文武官员、军民人等吸食不知悛改者，亦著一体查拿，分别办理。”

就在 25 日这一天，道光皇帝还首先从自己身边开刀，把皇族、宗室中吸鸦片的家伙拿出来示众：

革去亲侄儿庄亲王奕大的王爵，停发养赡钱粮两年；

剥夺辅国公溥喜的称号，也停发养赡钱粮两年；

三等伯爵贵明的爵位同时被削去。

10 月 28 日，又以“冒昧渎陈，殊属纰缪”为由，把两年前力主驰禁论（就是主张鸦片贸易合法化）的许乃济降为六品顶戴，并令其“即行休致”。

在此后的一个多月时间里，全国范围的禁烟运动迅速展开。

在广东，冯得圃等人因开设窑口、囤贩鸦片而被捕；

在福建，施猴等犯也因贩卖烟土被投入监狱；

在云南，下令禁种罂粟，并且惩办吸食鸦片的官吏；

在天津，大沽一带的洋船上，捕获烟贩邓然等犯，还起获鸦片 13.15 万两。

然而，道光皇帝清楚地知道，鸦片走私的根子在广州。因此，要禁绝鸦片，必须先铲除这个根。而要铲除这个根，又必须委派得力的大员去认真督办。于是，他于 11 月末宣令湖广总督林则徐进京商议。

12 月 26 日，林则徐风尘仆仆地来到了北京。第二天，皇帝便接见了他。据透露，道光皇帝在谈到鸦片对臣民的毒害时曾流着泪对林说：“此孽不除，我有何面目见列祖列宗于九泉之下！”由于君臣谈得极为投机，道光皇帝竟连续召见他八次，并赏赐他骑马游览紫禁城。一个皇帝如此隆信、眷顾自己的巨工，是不多见的。

当 1838 年最后一天来临时，林则徐被委派为钦差大臣，前往广东厉行禁烟。

诚如某些学者所说的那样，钦差大臣的官印代表着皇帝的全部权力，只有在特殊或紧急的情况下才授予某个官员。而 1838 年除夕之日，道光皇帝把这种权力授与林则徐，是经过深思熟虑的。首先，从 19 世纪 20 年代起，这位皇帝就一直赏识林氏的才干、人品以及他对朝廷的忠心。据史载，林则徐曾以赤手空拳，不流一点血，一度消弭了一次农民起义而出名。那是 1828 年（道光八年）松江泛滥成灾，当地人民群众抗议，知府出动了军队。当时作为该知府的一个幕僚的林则徐，却只单独地驾一叶扁舟前往，同起义者面对面地讨论他们的冤情。从那以后，朝廷总是委派这位大员去对付特别困难的局面。当了江苏巡抚后，林氏又很快博得“林青天”之名。再者，道光皇帝还一直看中林则徐所写的奏折，尤其是 1838 年夏季那三份关于禁烟的复奏，更令这位当今圣上折服，以至禁不住用朱笔图画出许多精辟之处。因此，让林则徐担负起禁烟的重担是最恰当不过了。

“揭来衔命驾锋东，要与愚氓洗鸩毒。欲挽颓波力恐微，试想燎原害诚酷。”——这是林则徐赴粤途中寄友人的一首诗。它真实道出了这位钦差大臣其时复杂的心情。

林则徐为什么会感到“力恐微”呢？因为他清楚地意识到此次使命非同一般，用他对好友沈鼎甫、姚春木、王冬书等人的话说，是“乃蹈汤火”，“身蹈危机”。

当然，林则徐的担心倒不是来自鸦片走私贩以及瘾君子的抵抗，而是气恼朝中军机大臣穆彰阿等传播禁论者的“忌阻”。林则徐始终忘不了在京期间，穆彰阿等常常对他面动难色，口出危言。

但是，林则徐毕竟是个爱国者。在他的价值观的天平上，个人的祸福荣辱终究难与民族利益划等号。所以，为了堵塞中国大患之源，除奸整溺，免毒流于四海，他决心“竭其愚悃”，置“祸福荣辱于度外”。

1839 年（道光十九年）1 月 8 日，林则徐启用钦差大臣官印，出京南下。据说，他坐乘十二人抬的大轿，随从只有一名管事、六个仆人和三名厨子，行李装在三辆大车上。事先，他就通知前方各站的地方官，不许他的随从向各站索取任何东西，因为他们已领取了饷钱和食宿费。他还通知说，为了“以节糜费”，各地方政府和驿站只须为他备办家常便饭，不许大张宴席，尤其不许搞燕窝烧烤之类。

如果说林则徐南下途中前半程还有点“力恐微”的感觉的话，那么行至江西，这种恐慌之感就一扫而光了。因为路经文天祥故乡时，两广总督邓廷桢和其他广东爱国官吏士绅，派人前来迎接他，并把广东军民斗志高昂的消息带给了他。他顿时振奋起来。特别令他高兴的是，上年 12 月 12 日，广州近万群众，自发掀起一场反击英美侵略者干涉中国禁烟的斗争。在这场斗争的鼓舞下，原来倾向驰禁的两广总督邓廷桢明确表示要“各扫疮痍，共培元气”，做到“普天率土处皆缉私之人，日日申禁烟之令”。这次他又写信向林则徐坦露道：誓“协力同心，除中国大患之源”。处于兴奋中的林钦差立即向广东发出了第一道禁烟令：将 61 名著名烟犯先行逮捕！这些人中，有的是多年来经营快蟹、扒龙的人，有的是衙门中纵容包庇贩卖鸦片的官弁。

1839 年 3 月 10 日黎明，林则徐到达广州花地。当天上午，林则徐在天字码头的接官亭（现北京南路江边），受到广东官员的隆重欢迎。广州各界同胞，欢欣鼓舞，奔走相告。一些外国人也坐上小帆船，窥探情况。有个美国人目击了当时的情景，描述说：“林钦差有庄严的风度，表情严肃而坚决。”

那里，广州正是春暖花开的季节，红棉绽开，万紫千红，群情高昂。林则徐看到这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了解到广东群众对侵略者“皆动公愤”的民情，就立即布置水师提督关天培，调遣兵船，把停泊在零丁洋面专门囤积鸦片烟的二十多艘英国趸船，严密监视起来。同时，他还呼吁广州各界人民——绅士、商人、军人、水手和农民——和他合作禁烟，并鼓励惯常吸烟者去掉他们的恶习，进而举例说有一个吸烟上瘾达 30 年之久的人，停止吸烟后，“则颜面发胖，筋力复强”。

在以后的一个星期内，林则徐完全忙于调查、会晤官员。他经常和高级官员一起进餐，其中有两广总督邓廷桢、广东巡抚怡良、海关总督豫坤、水师提督关天培。主要依靠郭桂船和梁廷枏的帮助，林则徐很快了解到了中外关系、鸦片贸易的细微情节。郭桂船当时是关部豫坤的书办，在林担任江苏巡抚时就十分仰慕他。梁廷枏是林则徐下榻的越华书院的监院。1838 年海关监督命他编集了有名的《粤海关志》。因其曾在海防书局任职，保存有许多外国请愿书、禁令、海岸战略要地地图、军事区和要塞规划，以及枪炮等武器图，郭桂船督促他选一些关于航海的重要文件，附上详细说明，送交林则徐。梁廷枏遂准备了大量材料，由郭桂船转交给林则徐。林则徐到广州后，一反惯例，立即造访梁廷枏，和他促膝长谈。

其时，不少洋人曾错误地认为，林则徐到广州引起的震波，一个星期就

会过去。因为他们的逻辑是：林氏的一些举动不过是给远在北京的皇帝看看而已。

然而，他们大错特错了。时隔 9 天，亦即 3 月 17 日，林则徐把当地一些行商、买办、通事召集到自己的官邸，一直询问到晚上。一位身临其境的人感到：林则徐提的问题很“深刻，切中要害”，“他了解情况之广之细，往往令众人吃惊”。

次日午后，林则徐又把所有行商召集到他的官邸进行长谈，并将两份钦差大臣文告分发给他们——一份是给行商的；另一份是让他们转给外商的。

在谈话中，林则徐严厉谴责了行商们的背叛行为。他说：“你们忘了朝廷对你们的养育之恩，竟然收纳汉奸为心腹，把政府准备做的每件事都预先透露给外国人，对政府询问外情则谎言以对。”他警告他们说，他的首要任务是惩办国贼，在行商中将有一两个被处死。

3 月 21 日是林则徐规定缴出鸦片的最后一天。

这天上午，“外侨商会”召开紧急会议，研究如何对付林则徐。

结果，外商们经过一翻密谋，决定损凑 1036 箱鸦片上缴，以图蒙混过关。

3 月 22 日，林则徐接到外国鸦片贩子答应呈缴 1036 箱鸦片的呈报。但林则徐没有被这种象征性的姿态所蒙骗。他的答复是：“这只是些零头，还有好几万箱呢”。此刻，林则徐又得到广州知府、南海、番禺知县的报告：“闻得米利坚国夷人多愿缴烟，被港脚夷人颠地阻挠，因颠地所带烟土最多，意图免缴。”于是，他当机立断，下令传讯颠地。而“颠地自知久惯贩卖，不敢遽出见官”。

3 月 24 日，英国驻华商务监督义律乘着由四名水兵划桨的“拉恩”号轻便快艇自澳门来到广州，准备帮助颠地逃走。这位来自苏格兰的皇家海军上校“确信坚决的语调和态度将会抑制广东省当局轻举妄动的气焰”。

但是，义律万万没有想到，就在他到达广州的当天，林钦差已以外商未报鸦片，意在观望，下令把停泊在黄埔的各国船舰先行封舱，停止买卖。这样一来，义律想带领颠地潜逃的计划，立刻成为泡影。

鉴于义律的对抗行为，林则徐于 24 日当晚下令封锁商馆，把义律和 320 名鸦片贩子一起禁闭里面，并撤走一切仆役和买办，限期如实呈缴鸦片。

到 3 月 27 日，义律见无计可施，便于早晨 6 时宣布“以不列颠女王陛下政府的名义并代表政府，责令在广州的所有女王陛下的臣民，为了效忠女王政府，将他们各自掌管的鸦片即行缴出，以便转交中国政府，并将从事鸦片贸易的英国船置于本人指挥之下，再速将各自手中英国人所有的鸦片开具清单，签章呈阅。……英商财产的证明及照本通知乐于缴出的一切英国人的鸦片价值，将由女王陛下政府随后规定原则及办法，予以决定。”第二天，又禀呈林则徐，说他“愿意严格地负责，忠诚而迅速地呈缴英商所有的鸦片 20283 箱”。

对于义律所提供的数字，林则徐诚恐不实，又找来几个华商和曾在水师做过事的人估计核实。据“称外夷高大趸船，每只所贮亦不越千箱之数，是趸船二十二只，核与报箱数不甚相悬”，这才放下心来。

当晚，林则徐又传见十三行总商伍绍荣等，盘问洋商在义律呈报缴烟过程中有否通同作弊，并严厉警告说：“汝为官商，倘有私许夷人以价而后设法赔补者，慎汝脑袋”！

4 月 2 日，林则徐宣布虎门外的龙穴岛为缴烟地点，并酌定限制：鸦片

缴出四分之一，允许雇用买办、工役；缴到半数，量许舢板请牌，查验往来；缴到四分之三，准予开舱贸易；缴完，一切照常。

4 月 3 日，林则徐最后修改酌定了经负责实际事务的官员反复研究后草拟的《收缴趸船烟土章程》，对缴烟的各个环节作了详细的规定。

4 月 9 日晚，林则徐接到关天培从虎门来信，报告首批趸船已由九州洋开到龙穴候缴。第二天，他便和两广总督邓廷桢、海关总督豫坤出靖海门，登舟前赴虎门。经过一天一夜的航行，11 日泊舟于虎门镇口。关天培前来迎接，并报告本日已收缴烟土 50 箱。

打这以后，缴烟工作顺逆相交。直到 5 月 18 日，22 艘趸船的 19187 箱和 2119 袋鸦片全部缴来。按一袋鸦片的份量相当于一箱鸦片计算，林则徐实际上收缴了 21306 箱鸦片，“核之义律原禀，应缴 20283 箱之数，更溢收一千袋有零”。这些鸦片合计 23 万余斤。

缴出的鸦片都临时贮存在虎门镇口。林则徐等人本计划要把这些鸦片解往北京，后因途程遥远，担心路上被人偷漏抽换，道光皇帝便于 5 月 30 日命令林则徐就地“督率文武员弁，公同查核，目击烧毁，俾沿海居民及在粤夷人共见共闻，咸知震詟”。

林则徐接到上谕后，马上在虎门镇口村（现东莞县太平镇）海滩边修造了两个长宽各十五丈余的化烟池。

1839 年（道光十九年）6 月 3 日，这是值得中国人民纪念的日子。虎门寨下，搭起一座礼台，挂起麒麟帐，铺着红色的毡毯，山前山后，扎满绿营哨兵。礼台前面，挂着一面黄绫长幡，上面写着“钦差大臣奉旨查办广东海口事务大臣节制水陆各营总督部堂林”，威武雄壮，迎风飘舞。这天，雨后天晴，骄阳高挂。从四面八方来围观的群众，人山人海。午后二点左右，留有长髯，神情刚毅的林则徐，在怡良等人的陪同下登上礼台。林则徐遥望南天，心潮澎湃，他庄严下令销烟。顿时，隆隆的礼炮声威震海空，站在两个销烟池旁的兵丁们忙碌起来了。先是从水沟里把水车入销烟池内，加入食盐，使池水成为盐卤，然后把一箱箱的鸦片运到池边，打开烟箱，将鸦片切开捣碎，投入池中，泡浸了一些时候，再撒下烧透了的石灰，顷刻间，盐卤沸腾起来，浓烟滚滚，升入天际。兵丁们手拿铁锄木耙来回翻搅，使鸦片完全消溶，等到海水退潮时，打开销烟池的涵洞，使鸦片随着浪花冲入大海；在涵洞上还装着网筛，防止未消溶的大块鸦片流出。看到这一切扬眉吐气的情景，人群中发出了雷鸣般的欢呼声。

为了让外国人“共见共闻”，6 月 13 日，林则徐发出告示，准许外国人到现场参观。

一些外国商人和传教士参观后惊叹道：“我们反复考察烧烟的每一个过程，他们在整个工作进行时的细心和忠实程度，远远地出于我们的意料之外，我不能想象再有任何事情会比执行这个工作更加忠实的了。”

一个名叫卫三畏的美国传教士当时也在场，事后他这样写道：“鸦片是在最彻底的手段下被销毁了，……在世界史中，一个非基督教的君主宁愿销毁损害他的臣民的东西，而不愿出售它来装满自己的腰包，这是唯一的一个实例。全部事务的处理，在人类历史也必将永远是一个最为卓越的事件。”

虎门销烟的壮举，一直持续了 22 天，到 6 月 25 日才结束。除留下 8 箱作为样品送往京城外，23 万余斤鸦片全部被销毁。它像海水冲刷烟膏那样，洗去了腐败无能的清政府强加给中华民族的耻辱，向全世界表明了中国人民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